

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局到底难在哪

■ 莫开伟 著名评论员

近日,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出席重庆市金融办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时指出:“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大家说了多少年,越说越难越贵,变成了一个痼疾。原因是文不对题,没有针对性,与虎谋皮。这些环节,你叫他们减少利息,不可能,所以说来说去,总解决不了。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是什么?就是资本市场。”(6月4日一财网)

客观地看,黄市长的话虽说得难听,但所表达的真实意思切合实际;把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现有融资机制和银行金融机构身上,确实有点“与虎谋皮”的味道。黄市长的观点无需过多数据来说明,仅近两年中央出台若干解决企业融资政策没有凸现较大成交,融资难、融资贵局面没有根本改观就足以说明黄市长观点的

正确性了。

那么,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局到底难在哪?其实,黄市长的话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难在融资渠道通畅和机制灵活。现有资本市场门槛过高,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债券受到严格管控,造成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受阻,把大量实体企业逼向银行间接融资绝路,使银行处于“养尊处优”地位,既形成了银行资金卖方市场,又颠倒了“上帝”与银行之间关系,使银行成了上帝,企业成了任上帝“宰割”的羔羊。

其次,难在金融经营机构遏制利益分赃。银行受迫求最大商业利益动机驱使,把社会责任挤压到“可有可无”状态,在对企业信贷投放中千方百计规避自身风险,极尽担保抵押之能事,把大量中小微企业推向了融资难尴尬境地。企业向大银行贷不到款,转而向信托、租赁、担保等所谓草根融资机构融资,实质上也是向名副其实的高利贷机构

融资;这些机构很多资金从大银行低利率借出来再转手贷给企业,只是中间经过了很多次中转,层层剥皮,大大提高了企业融资成本,怎么喊也无法使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下降。正如黄市长所言:“大银行漏出来的‘水’,再通过信托、租赁、担保等七弯八拐转给企业,原本6%年利息变成年息12%甚至15%。”最后又使企业绕回到融资难、融资贵老路上去了。

再次,难在中央政策与各级执行措施对接。这得从两方面讲,一方面制定政策时缺乏较强操作性和针对性,弹性空间过大,模棱两可,给各级金融机构以较多空子可钻。也正如黄市长所说:“原因是文不对题,没有针对性,缺乏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另一方面,各级金融部门有选择性执行政策,对自己有利的就执行,对自己不利的就采取拖延战术,或干脆打“迷踪拳”,架空中央政策,使中央政府制定有利于企业融资优惠政策悬

在半空,无法落地生根。

最后,难在监管到位和作为。中央政府近两年就解决企业融资问题,出台了若干优惠政策,包括定向降准、降息以及“金十条”等政策“组合拳”。但由于中央政府每项政策出台之后,监管部门对政策实施引导及实施效果监督没有跟进,缺乏相应配套考核机制,使中央优惠政策实质处于“放任自流”状态;更有甚者,监管部门相互之间存在着矛盾及监管政策打架现象,难以形成监管合力,使该对企业实施的优惠信贷政策或被大打折扣,或被“困死国房”,中小企业无法充分享受到政策“阳光雨露”。

显然,医治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痼疾,仅靠指望金融机构“慈悲为怀”和监管部门严厉监管,难以奏效,也难有希望可言。目前当务之急,是抓住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和完善企业融资机制这对主要矛盾,这对矛盾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

企业也才会走出融资难、融资贵“迷谷”。这条直接融资通道就是向所有企业打开资本市场大门,中央政府乘IPO注册制改革东风,加快中小企业上市融资步伐。正如黄市长所言:“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直接金融把它做大,让一大批企业,不管大企业、小企业(上市),大企业到A股去上市,中小微企业到转板、三板去上市。”同时,大力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直接融资体系;积极探索发展股权交易市场,支持中小微企业依托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开展融资。并允许有发展潜力、有信用资质和抗风险能力的企业向社会直接发行债券,扩大债券融资规模。只有这样,银行和其他草根“影子银行”资金才能真正由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也才能促使其自然降“身价”,把企业当成“上帝”和“衣食父母”,身份和地位变化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

警惕声誉风险毁了 P2P 行业

■ 林春浩 企业老总

某P2P平台声称要与招商银行发行联名卡,却遭招行辟谣;另一家P2P平台表示在银监会办公,银监会赶紧澄清;还有的P2P利用央行的名号大肆宣传……这些为了博眼球无下限宣传的事件在P2P行业并不少见,为了一炮走红,P2P平台通过夸大宣传、过度炒作来包装自己。(6月8日《北京商报》)

近两年来,P2P行业的声誉形象越来越令人担忧,声誉风险越来越大,进而影响到行业的健康发展,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所谓声誉风险,原来是指由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及其他行为或外部事件导致利益相关方对商业银行负面评价的风险。P2P行业作为一个新兴的金融细分市场,如今也面临着类似的风险。由于受到一些P2P平台在做了大量虚假宣传后,发生跑路、倒闭或者提现困难损害到投资人利益,进而使投资人对P2P行业产生了较大的信任危机,致使那些正常经营的P2P也受到牵连,遭到投资人质疑,平台无故失去了一些市场份额。

众所周知,随着中国P2P行业竞争日渐激烈,大量P2P平台越来越注重炒作,以此

提高平台的知名度、美誉度,增强客户的忠诚度,进而吸引更多的客户前来投资。由于P2P行业当前最受人诟病之处,就在于缺乏安全感,比如2013年以来共有676家平台发生问题,约占全国P2P数量的20%,严重影响到行业的声誉形象。因此,一些P2P平台为了获得更快的发展,往往借用银行、银监会等传统权威部门的名义炒作自己,提升市场信心,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炒作的 content 不实,就应该得到有效遏制。

笔者从一年半以前开始经营网贷平台,期间也不断研究分析同行的宣传推广模式。笔者发现,有些平台的炒作模式确实比较过度,为了能博取投资人眼球,他们甚至不惜大玩文字游戏,宣传一些貌似高额回报的活动,欺骗投资人前往投资,但投资人却很少得到超额实惠,结果是投资人迅速撤离,他们这种只做一次性生意的经营策略,往往以往劳无功收场。实际上,一些过度炒作的平台,由于投入了大量经费用于推广不实的产品或服务内容,结果投资人发现上当受骗后,便会纷纷离去,他们便陷进了财务危机,甚至倒闭。笔者在经营过程中,始终坚信诚信是金,只有凭借过硬的服务,才能吸引投资人重复投资,逐渐把平台做大做强。实际

上,国内有不少P2P平台,虽然在推广上缺少炒作,但他们由于诚信经营,在投资人群中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口碑,经营业绩蒸蒸日上。

那么,P2P行业应该如何集体面对当今的声誉风险呢?笔者认为,至少要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P2P行业不妨主动寻求搭建诚信平台。在政府或相关协会牵头指引下,达成行业自律共识,制定行业诚信规则,共同塑造行业诚信形象。实际上,近几年来,不少P2P平台为了长远发展大计,纷纷主动通过各种渠道寻求监管或规范,并赢得了一定的口碑。

其次,P2P平台在参与市场竞争的同时,要勇于主动打击那些损害行业诚信形象的行为。如果发现同行存在严重虚假宣传现象,要敢于向协会等有关部门反映,使不当宣传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最后,P2P平台要养成合理合法的炒作推广习惯,最好是通过传播正能量的形式,比如通过赈灾、扶贫、助学等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式,塑造企业的社会公民形象,进而有效化解集体声誉风险,使平台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

■ 邓昌发 评论员

6月6日,浙江杭州和北京,分别有一家华润超市内进行了一场“诚信测试”。当天,超市里没有营业员,购物、付款全部由顾客自助完成。据实验“发起人”蚂蚁金服方面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杭州,经过一整天的无人运行,应收账款和实际收款相差了3000元。(6月8日《钱江晚报》)

很多媒体报道“无人超市”时用了“国内首家”,不知是故意制造噱头还是真的纯属无知;至少,在笔者印象中,“无人超市”在中国已称不上十分新鲜。早在三年前,九江学院三名大学生就曾在校内开了一家“无人超市”,据说超市刚开张的一个多月,盈利了1000多元。另据报道,2013年,石家庄也曾有人开“无人超市”,只不过经营状况稍微差些,开业两个月亏损近千元。

在“无人超市”里拿东西是否付钱、付多少钱都由顾客自己决定,这种营销模式注定将“无人超市”与人性紧紧拴在一块,说具体点是个人诚信。正因如此,人们关注诚信的热度远远高于关注“无人超市”本身,甚至有人从“无人超市”在国外相当常见、中国“无人超市”付款率82%等现象,推断出中国社会诚信出现了不小问题,例如有三位女性现场拿走了价值昂贵的货物,而没有付钱;还有人拿走数袋价值不菲的烟酒,却只支付了十元钱……

诚然,中国社会诚信体系存在问题确实是事实。但这一问题并非人性伪善所致,而是制度机制不健全——如果说中国人的人品整体劣于欧美等国家,你信吗?反正我不信。人

类是极其复杂矛盾的动物,人之初,性本善抑或性本恶,都不能一概而论。我们所能做的也应该做的,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激扬性善、压制性恶。依此出发,京杭这两家“无人商店”并非折射社会诚信水准的镜面,因为它对人性中的善恶没有任何主动作为,反而让人质疑这种经营模式在纵容不诚信。

常识是,一个人也好,一个社会也罢,诚信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教育、法治、技术等手段管出来的;所谓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美好时代,只有在“小国寡民”的“熟人社会”才可能实现。“无人超市”在国外的之所以经营较好,奥妙也在其中。例如国外“无人超市”的大多数商品都有感应器,你不付钱,走到门口警报就响了;此外,超市内还有不少多角度摄像头,即便“偷”了东西,也不是一走了之那么简单,而在国外对公民不诚信的惩处往往相当苛刻。由此可见,国外“无人超市”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无人”——它们无时无刻不通过技术、规制等“眼睛”盯着消费者。

说到底,京杭这两家“无人商店”和国外的“无人超市”并不一样,后者符合当前商品经济和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并且具有完善的制度保障,而前者则缺乏必要的市场要素,不具有持续经营的能力,自然谈不上提高社会的诚信和道德水平。再说,诚信的试纸有很多,除了“无人超市”,地铁逃票、官员贪污、高考作弊等,无不拷问社会诚信。任何一个与诚信有关的领域出了问题,与其就此一味质疑中国人的人性瑕疵,不如高屋建瓴地好好反思一下如何全面深入地推进中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可怕的不是寡头垄断 而是行政垄断

■ 王传涛 职员

6月2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通报:云南省通信管理局牵头组织四家电信运营商达成协议,对赠送的范围、幅度、频次等进行约定,并通过下发整改通知书等手段强制执行,限制了电信运营商的竞争能力和手段。对此,云南省通信管理局进行了整改,并停止相关做法,中国移动、电信、联通、铁通四大电信运营商的云南分公司被处以罚款,共计1318万元。(6月4日《每日经济新闻》)

电信领域的垄断,公众并不陌生。然而,四大电信运营商的垄断模式,并非是传说中一家独大的“绝对垄断”,而是相对缓和的“寡头垄断”。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提出的“可竞争市场理论”:只要即使市场上仅有一家企业完全垄断,在潜在进入者“打了就能跑”的压力下,也将不得不制定经济利润为0的价格。这给了我国电信消费者以很高的期待。

广大公众与消费者,无不强烈期待四大运营商之间能够在彼此之间展开竞争,通过降低价格、提高服务来占领市场。我

们也可以从中受惠。然而,让公众失望的是,四大运营商之间竞争了二十年之久,也没有竞争出通信领域的高服务、低价格来。更骨感的现实是,如果不是在“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某IT企业吐槽了收费高、速度慢的网络服务现实并引起李克强总理的亲自过问,恐怕前一轮的网络降价提速方案,也不会到来。

四大运营商之间为什么没有竞争?这是一个困扰了广大用户多年的命题。妇孺皆知的道理是,如果市场中出现了寡头垄断,则非常容易形成价格垄断联盟。更可以肯定地说,四大运营商之间,形成了垄断联盟尤其是价格方面形成了联盟,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可是,究竟是谁先发起的垄断价格联盟,这个问题却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

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发起者不是企业,而是政府部门——云南省通信管理局牵头组织四家电信运营商达成协议并形成垄断联盟的新闻曝光,就证实了这一点。这说明,在一些地区,在一些领域,真正构成垄断的,并非来自于垄断寡头之间的合谋,而是来自于政府主管部门的所谓“协调”。是政府部门

不让四大运营商竞争,而不是说我国市场不适用“可竞争市场理论”。

更让人愤怒的是,政府部门滥用权力进行调控的方式非常隐蔽。都说市场规律是只“看不见的手”,政府的宏观调控是“看得见的手”。可是,在愈加强调“市场规律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当下,转型政府职能是一种必然要求。此语境下,一些政府部门滥用权力的做法,就只能越来越隐蔽。可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型是刚性的,政府要全面退出对经济的胡乱干预也不能打折扣,权力更要在阳光下运行,越是隐蔽的手段,越不应该使用。如其不然,就会严重扭曲或异化我国市场经济。

市场垄断中最可怕的是绝对垄断;然而,比绝对垄断更可怕的是行政垄断。因为,行政之手如果得不到约束,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再造一个又一个的绝对垄断。对此,政府相关部门要根据《反垄断法》,既要对涉事企业进行处罚,又要对涉事政府部门及相关官员进行处罚或问责。令人失望的是,现在的云南通信管理局只是要求整改,四家运营商也只被处以了1318万元的罚款。

戏画闲言

药械采购藏腐败



■ 吴之如 文并画

《经济参考报》报道,近期,各地相继曝出一批医疗领域腐败案件引发社会强烈关注。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当前医疗腐败集中在器械招投标、药品采购和基础建设三大领域,而前两者成为腐败高发区。业内人士及专家表示,药品定价虚高、“以药养医”并未明显改观、对商业贿赂处罚较轻,是医疗腐败屡打不绝的重要因素,未来宜深化改革综合施策治理畸形医商关系。

反腐败斗争正向各个领域纵深发展。由于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的现象不止出现在官场之中,还广泛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因而,当前在坚决反对官场腐败的同时,还必须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社会腐败。医疗腐败就是被民众深恶痛绝的社会顽疾之一,其中,又以医疗器械药品采购中的高额回扣不断将药品和器械的价格推向畸形虚高为甚。

本来,以治病救人宗旨的医药界是最受人尊敬的行业之一,众多医药从业人员为人民群众的健康事业默默奉献着自己的毕生精力和才智,他们的业绩永远铭记在大众的心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医务、医药界的某些人员,确实在一度流行于全社会的拜金观念的诱惑之下,弃守了职业道德,偏离了医药队伍的神圣职责,转而一头扎进了钱眼之中,甚至因此栽进了贪污受贿的腐败泥潭。而在器械招投标、药品采购方面表现突出的医疗腐败,不仅加剧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底层工农群众的看病难问题,更将相当一部分的医药从业人员推向了违法犯罪的可悲境地。有道是:

药械采购藏腐败,圣洁之地污浊来;还须深化改革策,邪恶清除谐境开。

人生在世,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生病呢。医疗卫生是同亿万人关系最紧密的切身利益所在,这个领域里的腐败不扫除,人民大众心境难安啊。

“变更到站”推行是助力出行好举措

■ 陈莉 国企职工

为满足旅客变更行程的需求,6月10日起,铁路部门将推出“变更到站”服务。旅客购票后,可根据行程变化,重新选择新的目的地,在车票预售期内变更到站及乘车日期、车次、席位。(人民网 6月8日)

近年来,随着铁路交通的日益发达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加之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活理念的极大改变,人们乘火车出行的热情高涨,“假日行”、“高铁游”、“一日游”等新兴出行模式也深受人们青睐。当自己的行程发生变化或是目的地改变时,更换火车票都先要经过退票这一关,铁路退票政策向来是舆论关注的热点,而此次铁路“变更到站”服务的推出,则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人们改签、变更到站车票的流程。笔者认为新政策节省了旅客改签车票的时间成本,同时

也省去了退票费的支出,更加方便旅客。为铁路部门这种人性化的服务点赞。

从延长车票预售期为60天、优化退票、改签规则、开车前30分钟依旧可以购票到此次的“变更到站”服务措施的推出,铁路部门在积极的探索中,力求在方便旅客的同时,赢得利益最大化。“变更到站”服务措施的推出,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它将为广大旅客出行带来进一步的便利:一是经济上更加实惠,旅客“变更到站”,如新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只需补足车票差价,不需支付原车票退票费;如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只需支付差额部分的退票费。二是办理手续更加简便,旅客“变更到站”,只需到车站窗口办理一次手续,无需像过去那样到车站窗口两次排队或在互联网上两次操作。三是出行更加便利,旅客可提前60天购票,并可在出发前根据自身需要,灵活调整出行计划。